

浙江新石器時代 的考古學文化

劉 軍

浙江石器時代考古，發展極不平衡。舊石器時代考古顯得十分薄弱，迄今為止發現的遺址僅有一處，幾乎是個空白。目前發現較多的是新石器時代遺址，不僅數量多，而且內涵豐富，以我省地名命名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就有三個：一是河姆渡文化；二是馬家濱文化；三是良渚文化。我省考古工作者經過幾十年的野外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基本弄清了杭嘉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序列，對寧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譜系大致也有個眉目。這兩個地區合稱浙北平原區，面積約1250平方公里。其餘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甚少，文化內涵也不甚豐富，因此，這些地區的文化面貌至今若明若暗，有待今後多做工作。

一 浙江史前文化遺存及其分佈

浙江省位於我國東南沿海，面向太平洋，境內有條錢塘江，江流曲折，又稱之江。全省陸域面積10萬多平方公里，是我國陸域面積最小的省份之一。浙江省包括了七十個縣，各縣市原始文化遺址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從目前的調查資料看，發現的遺址大部份集中在河流兩旁、山坡台地或近海山麓。有的遺址遺存距地表很淺，很多遺物如陶片、石器等多暴露在地面。有的遺址遺存距地表較深，隱藏在現代農耕土層之下，不易發現，若無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一般是很難發現的。

甲 舊石器時代遺址

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由於我們的工作薄弱，僅發現一處—建德縣烏龜洞。1973、1974年浙江省博物館自然部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共同對烏龜洞進行了發掘，出土了如大熊貓、東方劍齒象、中國犀、巨獾和後斑鬣狗等一批哺乳動物化石，

更重要的是發現了一枚人的牙齒化石，被稱為「建德人」^①。「建德人牙化石」經測定為距今五萬年，即相當於晚更新世，舊石器時代晚期。屬晚期智人。

「建德人」牙化石發現，揭開了我省舊石器時代考古的新篇章。

乙 新石器時代遺址

我省大部份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發現於浙北平原(圖一)，這與浙北平原優越的生態環境有著密切關係。浙北平原是泥沙在濱海和湖沼環境中堆積而成，地勢平坦，湖泊眾多，水網密佈，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是我省主要商品糧基地和桑蠶繭、棉花、黃麻等重要經濟作物區。新石器時代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與現在的情況有些差別。根據考古資料所提供的信息，這一帶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略高2-3℃，相當於我國現在的兩廣中部和南部、與海南和台灣的氣溫差不多，生態環境也類似這些地區。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為先民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資源。同時，也為先民們提供了豐富多采的食物來源。因此，浙北平原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而密集，這是可想而知的。在這裡發現有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遺址和羅家角遺址，還有距今六千年前後的馬家濱遺址和邱城遺址、四、五千年的良渚遺址。這些遺址具有代表性，它們分別代表著我省三種考古學文化遺址。近年來，在浙北廣袤的土地上新發現了許多類似上述類型的遺址，豐富了我們研究史前階段的新資料。

浙西新石器時代遺址偶有發現，但未有科學發掘材料，其文化面貌不明，有研究者認為：「推測有可能是來源於浙皖山區的另一支原始文化」^②。

Liu Jun : Deputy Director, Zhe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ina

劉 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浙南新石器遺址多屬山崗類型遺址，這裡的地表由於常年雨水沖刷，破壞較甚，遺物暴露在地表，石器多見小型石鏃、陶片表層多有黑色彩繪。根據採集的遺物分析，這裡的文化面貌可能與閩北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面貌聯繫密切。

浙西、浙南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有待今後進一步加強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工作來弄清楚。

二 浙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新發現

十多年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設進行考古發掘，在河姆渡文化遺址和良渚文化遺址考古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甲 寧紹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

寧紹地區和舟山群島是河姆渡文化的分佈範圍。這些年我們的工作重點放在寧紹地區，經過科學發掘的遺址有寧波慈湖遺址、奉化名山後遺址、象山塔山遺址、寧波北倫沙溪遺址、紹興馬鞍遺址、紹興仙人山遺址、蕭山跨湖橋遺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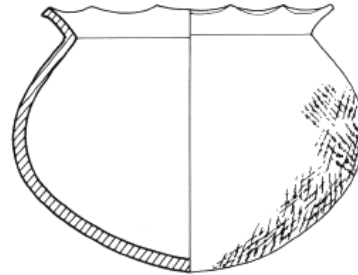
慈湖遺址發掘弄清了該遺址分上、下文化層。上層文化主要有泥質黑皮(衣)陶和夾砂灰陶，還有少量的混質橙紅陶。手製和慢輪修整的陶器兼而有之。素面陶多見，黑色陶衣見水易失，鏤孔和繩紋是本層陶器上的主要紋飾。器類較齊全，平底器、圈足器、三足器和袋足器均有發現。器種較多，可辨器形有釜形鼎、鏤孔圈足豆、雙唇帶槽平底罐(俗稱泡菜罐)、圈足盆、淺腹盤、斂口鉢、雙鼻壺、寬耳杯、器蓋等。本文化層陶器的基本特徵盛行黑色陶皮(衣)，胎色多樣，魚鱗形支撐的釜形鼎，飾圓形、方形和弧邊三角形鏤孔的圈足豆和侈口圓唇斜收腹的平底罐是本文化層的主要器物。除陶器外，還發現有段石鏃、石鏃(圖二.1)、石犁(圖二.2)等。下文化層分夾炭多色陶、夾砂灰陶和泥質黑皮陶。夾炭多色陶最具特徵，佔陶片總數的72.6%。陶器採用手製成型，器型厚薄不均。紋飾繁複，盛行附加堆紋間以刻劃紋，縱橫交錯的



圖二.1 石箭鏃 慈湖 T402(上):4
Stone arrowhead



圖二.2 石犁 慈湖採集
Stone plough



圖二.3 陶釜 名山 T0914(10):2
Pottery jar-pot



附加堆紋。豎向細繩紋及橫向籃紋。器類方面不見平底器，圓底器特多，少見圈足器和三足器。器種簡單，有釜、罐、盆、盤、鉢、豆、器蓋和釜支架。其中夾炭多色陶釜為大宗，這兩種器物最富特徵。

名山後遺址共有12層。8層以下屬河姆渡文化遺存，出土有泥質紅陶喇叭形圈足豆、雙目式鴨咀形足的繩紋釜形鼎、多角沿繩紋圓底釜(圖二.3)、侈口束頸夾炭紅衣陶罐。第2至7層出土的陶器以夾砂紅陶數量最多，泥質黑陶頗具特色，還有泥質灰陶、泥質紅陶和少量夾砂黑陶。夾砂紅陶以砂粒、稻殼、介殼末加屬和料，器表有的經打磨，有的似有層紅色陶衣。可辨器形有夾砂紅陶魚鱗形足鼎(圖二.4)、泥質黑陶竹節把豆(圖二.5)、雙鼻壺、泥質紅陶戳印紋罐、雙唇帶槽罐。陶器多素面，鼎上繩紋少見，豆盤外壁飾陰刻精細的鳥為主題的花紋(圖二.6)，豆把上多見鏤孔裝飾。另外，還發現一些石器，如石耘田器(耜冠)(圖二.7)等。

象山塔山遺址共分九層。^⑬第7、8、9層及墓地屬河姆渡文化層，年代相當河姆渡第三期文化前後；第5、6層良渚文化層，年代相當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砂紅陶為主，泥質灰陶、泥質灰胎黑皮陶次之。陶器主要有魚鱗形足鼎、T字形足盆形鼎(圖二.8)、泥質黑皮陶竹節把豆、雙鼻壺(圖二.9)、寬把杯、灰陶圈足盤等。還有有段石鏃、三角形石刀(破土器)、耘用器(耜冠)等。

紹興馬鞍遺址出土的陶器以夾砂紅陶、混質灰陶和泥質黑皮陶為主，素面陶器多見，偶見鏤孔和附加堆紋。陶器以橫斷面呈Y字形的鼎，形式多樣的豆和帶圈足的盆組成最常見的器物群。^⑭

紹興仙人山遺址分上、下二個文化層。^⑮下文化層可辨器形有夾砂紅陶魚鱗形足鼎，泥質灰陶圈足盆、罐，黑皮陶鏤孔竹節把豆，未見繩紋和印紋陶。石器有斜柄石刀(破土器)、有段石鏃、柳葉形箭鏃等。

乙 杭嘉湖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

杭嘉湖地區是馬家濱文化和良渚文化分佈範圍的一部分。這十幾年也是以配合基本建設進行的，工作的重點是良渚文化遺址的發掘，如海寧三官墩遺址、餘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海寧荷葉地良渚文化遺址、餘杭廟前遺址、餘杭鉢衣山良渚文化遺址、餘杭吳家埠遺址、海寧千金角徐步橋、盛家埭等遺址。

三官墩遺址分上、下二個文化層。^⑯下層屬良渚文化層，出土有夾砂紅陶魚鱗形足鼎、圈足壺，混質黑陶雙鼻壺、矮圈足豆、盞、罐、盆、器蓋等，還有柳葉形石鏃、石鏟和耘田器(石耜冠)。同時還發現良渚文化小墓，陪葬品中陶器的基本組為鼎、豆、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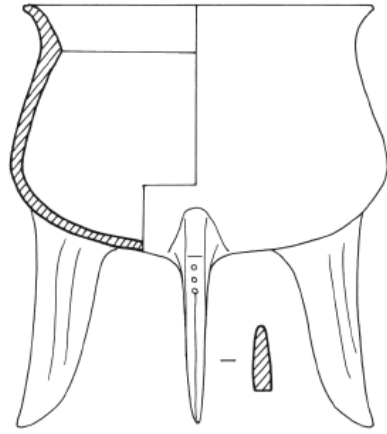
反山良渚文化墓地^⑰，全係良渚文化時期人工堆築起來的墳山，11座大墓出土大量的禮儀用玉和裝飾佩掛用玉。琮、璧、鉞是主要陪葬品，而琮的四面雕刻有細如毫髮的神人獸面圖形。

瑤山祭壇遺址^⑱，係良渚文化時期人工建造起來的一座方形祭壇，祭壇上同時發現11座良渚文化貴族墓葬。也發現精美的玉禮器和佩飾。唯獨在這裡未發現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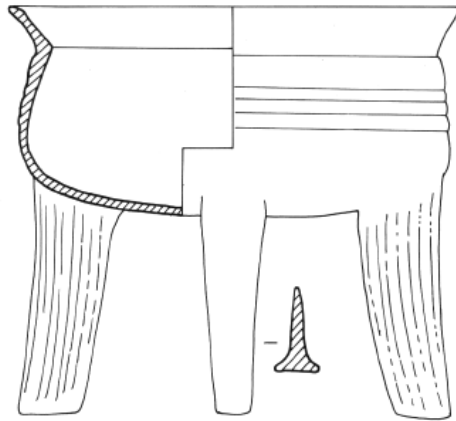
荷葉地良渚文化墓地^⑲，發現16座良渚文化時期墓葬，墓葬中的陶器以鼎、豆、壺為其主要組合。也還有琮、璧、鉞等重要禮器。同時伴出的還有石鏃、石犁等器物。

鉢衣山遺址發現4座良渚文化小墓。^⑳隨葬品中有玉璧、玉鏃、玉冠狀飾、玉錐形飾、管、珠等玉器。陶器有鼎、豆、雙鼻壺、缸及石鉞。

廟前遺址共分七層。^㉑第2-3層為良渚文化時期的堆積，第4-7層為馬家濱文化層。發現32座良渚文化時期的墓葬。陪葬的陶器有夾砂紅陶魚鱗形足鼎、夾砂陶罐、泥質陶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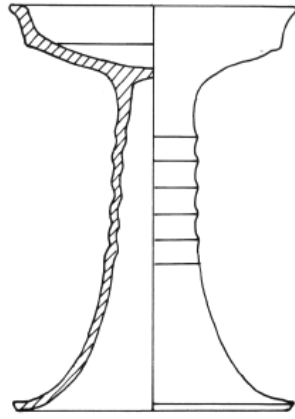


圖二.4 陶鼎 名山 H12:1
Pottery trip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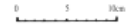


圖二.4 陶鼎 名山 H14:44
Pottery tripod

0 5 10cm



圖二.5 陶豆 名山 H31:1
Pottery stem c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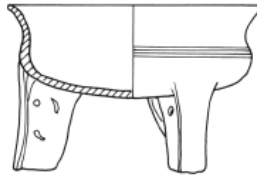


圖二.6 豆體鳥紋摹本
Bird design on stem cup





圖二.7 石耘田器（耘冠）名山 T1415(3):1
Stone cultivating instru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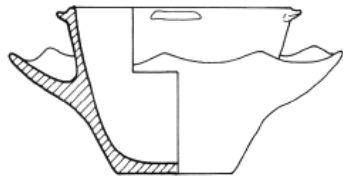


圖二.8 陶鼎 象山塔山
Pottery trip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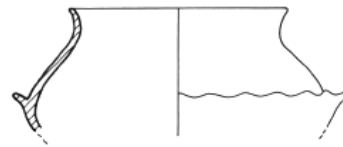


圖二.9 雙鼻壺 塔山
Pottery j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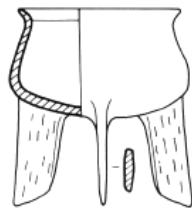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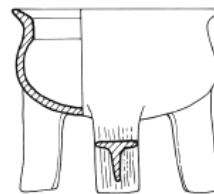
圖三.1 陶釜 吳家埠 T30:16
Pottery fu-p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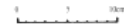
圖三.2 陶釜 吳家埠 T42:12
Pottery fu-p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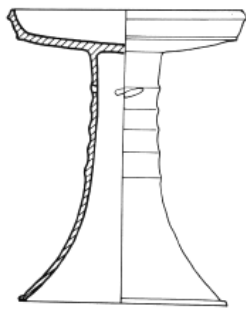


圖三.3 陶鼎 徐 M7:1
Pottery trip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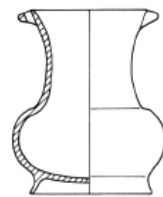


圖三.4 陶鼎 徐 M12:4
Pottery trip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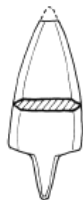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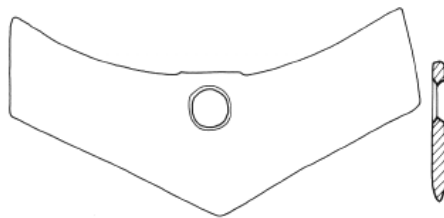
圖三.5 陶豆 M4:16
Pottery stem c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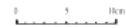
圖三.6 雙鼻壺 徐 M4:2
Pottery jar



圖三.7 石鏃 平 M12:4
Stone arrowhead



圖三.8 石耜冠 徐 M10:2
Stone cultivating instrument



吳家埠遺址共分四個文化層。¹¹²包含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三個發展階段的內涵。第一、二文化層屬良渚文化層，出土有以魚鱗形和T字形足的鼎、粗矮把豆、圈足簋等主要器物，應視為良渚文化早期階段。第二文化層多見扁鑿形、扁鐘形足的鼎、弧斂口和折斂口的鉢形豆盤加多節多突籬為豆把的喇叭形圈足豆、花瓣形圈足等，其文化面貌應屬崧澤文化階段。第三、四文化層主要器物有腰沿釜(圖三.1,2)、喇叭形圈足豆、側把盃和牛鼻耳罐等，其文化面貌屬馬家濱文化。

海寧千金角、徐步橋、盛家埭、平湖平邱墩等遺址發掘了61座良渚文化墓葬¹¹³，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陶器有夾砂紅陶、泥質灰胎黑陶等陶系，陶器多素面，少數飾弦紋、鏤孔。器形主要有魚鱗形和T字形足的鼎(圖三.3,4)、竹節把豆(圖三.5)、雙鼻壺(圖三.6)、闊把杯、簋等。石器有鉞、鏃(圖三.7)、刀、斂、耘田器(石耜冠)(圖三.8)等。

三 文化特徵

根據已有資料，河姆渡文化、馬家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石器和陶器方面的特徵歸納如下：

甲 河姆渡文化特徵

生產工具以小型石器為主，早期打琢痕跡明顯，僅刃部磨光，晚期多磨製，主要器形有斧和鏃。並出現玦、瑣、管、珠等飾件。早期有大量的骨製生產工具，以耜、箭鏃為主。

陶器分夾炭陶、夾砂陶和泥質陶，以夾炭灰黑陶和夾紅(灰)陶最富特色，手製紋飾以繩紋為主。主要器形有釜、罐、盆、盤、鉢、盂、豆、鬲、盃、甗、灶和陶支架。早期炊器全是釜，晚期出現少量的鼎，但仍以釜為主要炊器。各型帶脊釜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雙耳罐，鉢式、盤式為豆盤的圈足豆，管狀嘴的盃，垂囊盃，陶支架是河姆渡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乙 馬家濱文化特徵

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磨製較精，主要器形有弧背鏃和穿孔舌形斧。有一定數量的鏃、錐、針等骨(角)工具。有玉玦、玉瑣等飾件。

陶器分夾砂陶和混質陶，以外紅 裡黑或表紅胎黑的泥質陶最具特色。陶器多素面，主要器形有釜、鼎、罐、豆、盆、盤、鉢、甗等。早期炊器以釜為主，晚期炊器中新增了鼎，釜、鼎共存。各型腰沿釜是馬家濱文化的典型器，喇叭形圈足豆、牛鼻形器耳、條形爐箆、三足側把盃等亦是馬家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丙 良渚文化特徵

生產工具以石器為主，種類較多，製作精細，有段石鏃、扁平長方形穿孔石斧、兩端上翹、中上部穿孔的耘田器(石耜冠)、三角形石犁、有柄石刀為特徵性器物。

玉器種類繁多，以琮、璧為大宗，琮體紋飾多見弦紋、重圈紋、突出的橫棱和神人獸面紋，紋飾繁縟精細，形象逼真。

陶器以夾砂褐陶、泥質磨光黑皮陶和泥質灰陶為主。輪製。代表性器物有魚鱗形、丁字形足鼎，高頸雙鼻壺，寬把杯，竹節形高把豆，圈足盤，袋足鬲等。其中高頸雙鼻壺的壺身、壺蓋和鼎的身、蓋細刻的圓渦紋、蟬螭紋，卷雲紋、鳥紋、編織紋、曲折紋、鉤連紋圖案，及鼎足上鏤刻新月形鏤孔，是良渚文化製陶工藝上的一大特色。

四 浙江新石器時代有關問題的討論

通過對浙北杭嘉湖地區和寧紹地區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簡略介紹，我們不難看出，這兩個地區原始文化在早期階段就存在著相互間的接觸和交往，時間越晚，文化性質越進步，這種交往和影響的範圍也越來越大，文化面貌也漸趨一致。

對浙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係，多年來有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

爲：河姆渡文化→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第二種意見認爲：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濱文化是並列的兩支原始文化，各有自己的發展序列。第三種意見認爲：河姆渡文化、馬家濱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遺存，但到了約當良渚文化階段時，這兩種文化的地域特色很少了，只能歸入良渚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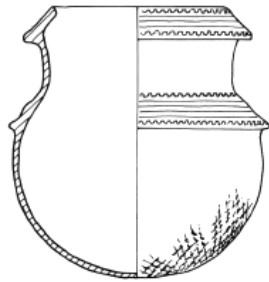
從迄今爲止的現有考古資料來看，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濱文化，並沒有直接發展變關係。桐鄉羅家角遺址第四文化層是馬家濱文化的早期類型，其絕對年代距今約7100多年，這可以說羅家角遺址最早的年代比河姆渡遺址還要早100多年。很顯然從時間上看馬家濱文化不可能由河姆渡文化發展而來。羅家角遺址從第四層到第一層文化堆積，提供了馬家濱文化發展階段的地層依據。從文化內涵看，河姆渡遺址和羅家角遺址早期地層中都存在有肩有脊的斂口釜和斂口釜(圖四.1.2)，傳遞了這兩種文化早有交往的信息。但是，河姆渡遺址早期地層中不見羅家角遺址早期地層中的腰沿釜(圖四.3.4)。這是爲甚麼？道理很簡單，這種差別正好說明了這兩支原始文化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它們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河姆渡遺址的肩脊釜是河姆渡遺址的主要炊器，並且是寧紹地區河姆渡文化的主流器物，是河姆渡文化賴以存在的獨特內涵和面貌。但在羅家角遺址的較晚地層中，這種肩脊釜卻消失得無影無蹤。隨著帶脊釜的消失，腰沿釜取代了肩脊釜，一躍而成主流器種，成爲杭嘉湖地區馬家濱文化的主要炊器。因此，肩脊釜和腰沿釜成爲判別河姆渡文化與馬家濱文化的主要標誌，在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濱文化中分別居於主導地位，且由此決定了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濱文化是兩支並列的不同的原始文化。

河姆渡文化經過二千年的發展歷程，期間和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有了頻繁的交往，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樣，一種文化不可能孤立發展，它要與其它文化發生聯繫，進行傳播或相互吸收。杭嘉湖地區的居民可泛舟渡江到寧紹地區去，同樣，寧紹地區的居民也可泛舟渡江到杭嘉湖去進行相互交往，互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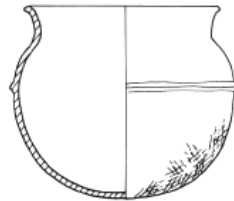
有無。因此，從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濱文化早期開始，杭嘉湖地區的居民與寧紹地區的居民有了交往，並吸收了對方的部分文化因素。如馬家濱文化的喇叭豆、牛鼻耳罐，崧澤文化的飾圓形及弧邊三角形的鏤孔豆、折肩折腹罐、花瓣形圈足等在河姆渡晚期文化中可找到相似或相近器形。石器也是如此。即便是這樣，其主流器物仍然是以施繩紋的帶脊釜(圖四.5.6)爲主要炊器。正因爲如此，「對於河姆渡遺址上、下兩大層(指3、4層和1、2層)的分期問題，我傾向區別對待，但決不忽視兩者間傳承關係。因此，認爲把上面兩層直稱馬家濱、崧澤是不準確的。」⁽¹⁴⁾在河姆渡第四期文化之後，河姆渡文化分佈範圍內的後續文化，器物的型制與杭嘉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內涵在許多方面表現出相似和一致性，典型器物由量變發展到質變。不論是石器或者是陶器，陶器方面表現在陶系、陶質、花紋裝飾、製作工藝、器類器種等都與良渚文化十分相似，有的器物簡直是像出自一人之手。

良渚文化石器中的石犁、石耘田器(石稻冠)、三角形斜柄石刀、柳葉形石鏃是最具有特色的石質生產工具。這些石器在寧紹地區的河姆渡後續文化中都可找到相似或相近的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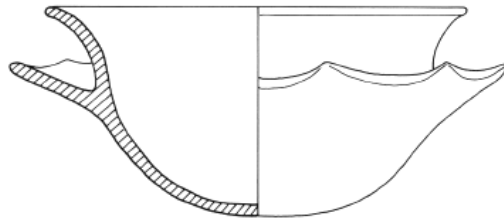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砂紅陶、泥質灰陶和泥質黑陶爲主。器表多素面，唯獨鼎、豆、壺等器表的顯著位置偶見細刻鳥紋和「鳥頭蛇身」紋。陶器多採用輪製成型，器表多經打磨。陶器常見三足器、平底器、圈足器、袋足器、圓底器，主要器種有鼎、豆、壺、罐、杯、盞、盤、盆、鉢以及鬚、盞等。而魚鱗形足的鼎、T字形足的鼎、竹節把豆、長頸雙鼻壺、貫耳壺、翹流寬把杯和小口錐刺紋罐等是一群典型器物。這些器物在河姆渡後續文化遺址地層中都能見到相似或相近的型制。因此通過器物、特別是對陶器的比較研究，河姆渡後續文化的文化面貌除了不見琮、璧等大型玉禮器外，與杭嘉湖地區良渚文化的文化面貌已經看不出甚麼差異，此時錢江南北兩大塊原始文化基本上已融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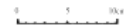
圖四.1 陶釜 河姆渡 T234(4B)315
Pottery fu-p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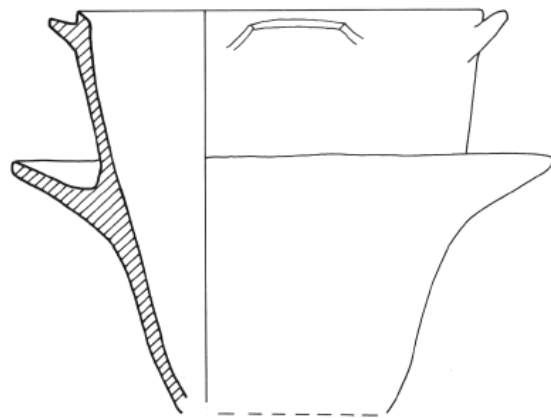


圖四.2 陶釜 河姆渡 T242(4A)227
Pottery fu-p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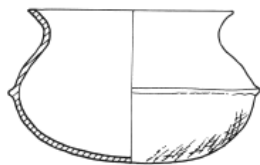


圖四.3 陶釜 羅家角 T140(三):22
Pottery fu-p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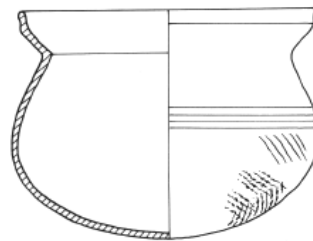




圖四.4 陶釜 羅家角 T128(三):20
Pottery fu-pot



圖四.5 陶釜 河姆渡 T225(三B)82
Pottery fu-pot



圖四.6 陶釜 海姆渡 T226(二B)19
Pottery fu-pot



體，但存在著地域性差異，這種地域性差異構成了杭嘉湖和寧紹地區良渚文化的不同類型。

自從河姆渡遺址和羅家角遺址發現以來，迄今為止，浙江尚未發現比這兩處遺址更早的遺址。河姆渡和羅家角遺址是浙北地區已知的兩處最早的農業經濟遺存，都發現了不少的栽培稻穀，並且都有豐富的農業生產工具伴隨出土，說明此時的農業當不是最原始的農業形態，而且經過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農業發展期。兩者的年代上限距今7000年左右，估計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年代應提前，因此，探尋原始農業生產活動的產生地點成了我們多年以來的願望，希望在尋找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方面有所突破。從浙江發現的幾處年代較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如河姆渡、邱城、吳家埠、跨湖橋等遺址都分佈在山麓地帶，並且在奉化名山後、象山塔山遺址早期地層中也發現有類似細石器的小石器等級。據此，有理由認為尋找浙江早期遺址，應該注意山地周圍古文化遺存。但也有研究者認為羅家角、馬家濱、彭城等遺址都分佈在平原之中，覺得浙江早期古遺址探索的目標不在山麓，而在濱海、大陸架或「挖穿」生土層，也不是沒有道理。據對一萬年來長江下游地區環境研究者們的研究，得知「大約在距今11,000—10,000年前，隨著氣候開始回暖，環境好轉，人類也開始在平原地區進行動植物最早時期的馴化和栽培活動」⁽¹⁵⁾。這就是說農業出現的時間在萬年以前是可能的，地處長江中游的湖南省澧縣大坪鄉彭頭山遺址距今8000至9000年，彭頭山文化發現大量的稻穀，而且穀粒較長，有明顯的人工選擇栽培跡象，為我們尋找早期農業遺址增強了自信心。前已闡述浙北平原有優越的自然環境，最適於農業生產活動的地區之一，根據中國水稻研究所湯聖祥博士、日本國立遺傳所佐藤洋一郎教授、浙博俞為潔合作利用電子顯微技術發現河姆渡出土炭化稻穀中有個別普通野生稻的穀粒，為採集植物的馴化進入農業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條件，使浙北平原迅速進入較高的農業經濟文化類型，才成為可能，才能出現像河姆渡、

羅家角這樣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址。因此早期農業遺存在浙北平原應該有，而且應該能夠找到，尚待時日。

註釋

- (1) 韓德芬等：〈建德發現的一枚人的犬齒化石及浙江第四紀哺乳動物新資料〉，《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16卷第4期，1978年。
- (2) 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初步認識〉，《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 (3) 〈象山塔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1989年。
- (4) 〈紹興縣馬鞍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1985年。
- (5) 〈紹興縣仙人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1986年。
- (6) 〈浙江海寧三官墩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1987年。
- (7) 〈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
- (8) 〈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
- (9) 〈海寧荷葉地良渚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1989年。
- (10) 〈餘杭縣鉢衣山良渚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良渚廟前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穫〉，《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科學出版社，
1993年。

-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吳家埠新石器時代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科學出版社，1993年。
-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北部地區良渚文化墓葬的發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科學出版社，1993年。
- (14) 蘇秉琦：〈中國河姆渡文化序〉，《中國河姆渡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5) 徐馨、沈志達：〈全新世環境—最近一萬多年來環境變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41。

Neolithic Cultures in Zhejiang

Liu Jun

[Abstract]

The province of Zhejiang has yielded many significant Neolithic sites with a huge number of valuable finds. Most of the sites, including those belonging to the famous cultures of Hemudu, Majiabing and Liangzhu, are situated at the northern plain area which is further divided by the Hangzhou Bay into two regions: Ningbo and Shaoxing to form one, and Hangzhou, Jiaying and Huzhou to form another. The unique geographic setting of this area had brought to it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on which Neolithic settlements subsist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northern plai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other parts of Zhejiang are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and finds scarce.

The Ningbo-Shaoxing region falls within the extent of the Hemudu culture. Since the 1980's, extensive salvaging excava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in this area have brought to light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Neolithic sites and tombs including Cihu and Shaxi in Ningbo, Ma'an and Xianrenshan in Shaoxing, Mingshanhou in Fenghua, Tashan in Xiangshan and Kuahuqiao in Xiaoshan. As for the Hangzhou-Jiaying-Huzhou region, it comes within the extent of the Majiabing and Liangzhu cultures. A number of Neolithic sites and tombs have been uncovere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s are Miaoqian and Boyishan in Yuhang; Qianjinjiao, Xubuqiao and Shengjiadai in Haining. Excavations in

these two regions have revealed abundant archaeological data significant to the study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Zhejiang.

As seen from the finds, the Hemudu culture is characterised by small stone axes and adzes, charcoal-filled corded black pottery with or without coating and *fu* with flanged sides; the Majiabing culture by more refined stone adzes and perforated axes, black pottery with red coating and *fu* with ridged waist; the Liangzhu culture by finely crafted stone implements including cultivating instruments, wheel-thrown pottery and a large variety of exquisitely carved jad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three cultures is a question of interest. Some archaeologists think that they are successive cultures of the same lineage while others opine that Majiabing culture is unlikely to have been developed from Hemudu culture. The writer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latter. He points out that the Hemudu and Majiabing cultures should belong to two separate yet parallel systems, but their cultural diversities became less and less distinct as they evolved o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 northern plain of Zhejiang had practically merged into an integrated whole with only minor regional differences.